



家国记忆中的岁月芳华

——《一百年，许多人，许多事》读后

人活世上，或多或少都会存留一些关于人、关于事，关涉个体与家国的众多记忆。透过这些一鳞片爪的轶闻趣事，不仅能够忠实记录下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史，而且，还能从一个个侧面，生动映射出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。世纪老人、翻译名家杨苡的口述自传《一百年，许多人，许多事》，便是这样一本寓意深刻之作。

该书由南京大学教授余斌历时十年整理撰写，让一个世纪的人和事在杨苡先生的叙述中缓缓展开。书中，杨苡以阅尽千帆般的从容，热切回忆了自己出身书香世家，到就读天津中西女校，再到西南联大潜心研学的难忘经历。作为五四运动的同龄人，在其百年人生旅程中，杨苡先后经历了军阀混战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新中国成立等一系列大事变。幼年时期的她，无论是就读私塾，还是在中西女校接受新潮的现代教育，抑或是在西南联大聆听众多国学大师们的谆谆教诲，在其缤纷的流年里，有许许多多平凡的人和平凡的事，在她平静的心湖中，投下过斑斓的七彩“华石”，带给她或深或浅的心灵悸动。

杨苡先生的自述中，她没有刻意去讲述那些国仇家恨的大事件，反而云淡风轻地娓娓讲述着生命过往中，

那些焮热过她心扉的亲情、友情和爱情。诸如，隐忍要强的母亲、家里的丫环、厨子、仆人、兄弟姐妹、亲戚等等。这些勤劳朴实的众多“小人物”，以自己独特的方式，把爱的阳光雨露，慷慨无私地泼洒进她幼小的心田，赋予着她向上的豪情。时光流转，沧海变桑田，青年时代的杨苡思想上也开始发生急剧转变，源自时局的犀利洞察、对人情的深刻把握，终于让她对自己的封建家庭有了脱胎换骨的认识，于是，她渴望着早日走出这个幽闭的“小院”，到广阔的社会天地里去经风雨、见世面。后来，她结识了仰慕已久的巴金，并与之保持终身的友谊与通信。

上世纪四十年代，杨苡不负众望，一举考取了西南联大，并在这座宏大的知识殿堂里，进一步拓展了胸怀和视野。在这所大学里，沈从文、陈梦家、朱自清、刘文典、闻一多、吴宓、余冠英、陈福田、叶公超等名家名师，不仅以丰厚的学识，给她以精神上的助力，还以广博的思想，教会了她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。在杨苡眼里，沈从文的勤勉用功，刘文典的恃才放旷，闺蜜兼挚友萧珊、王树藏、穆旦的心心相惜，都是那么令人难以忘怀，那些求学、恋爱、饮食、起居中的琐碎家常，如浓浓的手足情，恰似缱绻的师生爱，点点滴滴散发出来，深慰着人心。令人开怀的是，有一年除夕，杨苡和萧珊、王树藏三个女生到沈从文的宿舍守岁，聊到子夜时分方才回去。沈从文于是为每人发了一根甘蔗，嘱她们既可吃，又可防坏人。路上，三人手持甘蔗，边吃边乐，还大声唱着抗战歌曲，

壮着胆子……这一幕幕情意深长的桥段，如长焦镜头似的频频闪回于杨苡的记忆中，悉心勾勒出一幅“联大人”在艰难岁月里同舟共济的温情画卷。

与此同时，杨苡亦把深情的目光，热情投注于她生活的那个时代。在国家的危难时期，她曾和许多热血青年及爱国志士一样，没有躲进小楼成一统，而是时刻不忘自己的民族大义。她们在硝烟和炮火中慨然前行，奔波于天津、上海、香港、昆明等地。同行者中，有辗转了大半个中国，前往后方求学的青年学子；有抗战胜利后挤在甲板上风餐露宿、顺江而下归家的人们；还有在日本飞机的“眷顾”下，从容展开稿纸，如常进行文学创作的巴金；在昆明大轰炸的隆隆呼啸声中，抖去一身的灰土，手持教鞭继续讲课的闻一多；防空警报刚一解除，便急急匆匆拿起手杖赶往治学路上的吴宓……她和他们，无论有名的，还是无名的，在国家存亡的危难关头，始终团结在一起，“把自己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”。这就是世纪风华里的家国情，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，他们丝毫不惧个人的安危，毅然挺身而出，激昂地走在时代的前列，渴望用正义的火把，驱走残暴和邪恶，给追求光明的人们带来希望和憧憬。

掩卷长思，早春时节，虽然首创“呼啸山庄”译名的著名翻译家杨苡走了，但她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和众多温情记忆，连同她的系列作品一起，温暖着我们的情怀，深深地烙印在历史的长廊中，迸发出光芒……

钟芳



《千面宋人》



本书围绕120余封宋代士大夫之间的往来私信，结合史料重新解读这些孤立的历史碎片，将书信中所涉的人、事、物及背后的故事巧妙地糅合成一个个完整的故事，从战场、为官、治学、人情、生死五大方面剖析宋代文人的社会关系、政治倾向、内心情感和才华品级，最后还原出一幅在宋代历史大背景下宋人普遍具有的性格共性拼图。

作者仇春霞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。著有《千面宋人——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》《新疆美术理论(1949—2009)》；编著有《画论备要》《书论备要》等。

《异乡人》



这本书是青年作家子禾的首部非虚构作品，书写自己在北京十年间生活经验，照见最普遍的你我人生，勾勒巨变时代的幽微侧影。亲历者在离开之后成为旁观者，子禾的叙述带着一种距离感，过去的日子犹如蛇蜕，蛇蜕不足写，它在风中转移掉的部分更值得记录。相信这份带着温度的记录，能够撕开生活的“表皮”，让我们透过这微小的缝隙，看到时代的暗流，看见真实的自己。

作者子禾，作品散见于《十月》《诗刊》《人民文学》《山西文学》等文学刊物。代表作有长篇小说《老猴》。

《长安的荔枝》



唐朝诗人杜牧的一句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”一千多年来引发了人们的无限遐想，但荔枝的保鲜时限仅有三天，这场跨越五千余里的传奇转运之旅究竟是如何达成的，谁让杨贵妃在长安吃到了来自岭南的鲜荔枝？作者马伯庸就此展开了一场脑洞非常大的想象。沿袭马伯庸写作一贯以来的时空紧张感，不仅让读者看到了小人物的乱世生存之道，也感受到了事在人为的热血奋斗。

作者马伯庸，作家。代表作：《大医》《两京十五日》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《长安十二时辰》《古董局中局》《三国机密》《风起陇西》等。



意象与具象的完美结合

——评《飞鸟和池鱼》

张惠雯的四部小说集《两次相遇》《一瞬间的光线、阴影和色彩》《在南方》《飞鸟和池鱼》存在内在关联，他乡与故乡是作品的基础视界，她记录并修正自己在不同人生阶段对平凡日常的体认。如果说《在南方》是对他国生活的首次检视，那么新作《飞鸟和池鱼》是对家园记忆的重新确认，同时，后者还承接与《两次相遇》的连续性，它转达对故土“再次”目之所及的新变和心之所念的新知，演绎散文集《惘然少年时》记述的青春情怀。

我必须直面“飞鸟”和“池鱼”预设的意象性，它自然是新小说集不可绕开的议题。被困与解救的对抗是两者产生矛盾性的根本动因。《飞鸟和池鱼》保持张惠雯对女性问题的思考，坦诚当下女性的共性困境：你喜欢的人和你不喜欢的人生活捆绑在一起。她运用无性别的写作方式标明性别态度。两性都可以担任故事主体，两性处境都可以成为叙事内容，她其实是以中性立场关照生活，从各自角度站位检视，获取对两性选择的理解和谅解。事实上，其作品对男性心灵层面的剖析被忽略了，男性形

象特色在于剥离了根植于创作者本人性别的经验性，而更趋向理性。“他”实为“归来”系列中主导寻找行动的施事者。斯坦纳以梅里美的“卡门”为例，提出虚构作品的奇妙生命力，“无论卡门多么浅薄、怪异、轻浮，她与其他不朽的虚构人物一样，有一个核心的品质：她说出了我们的心声。像艺术中一切伟大的人物，她既是我们的镜子，又是我们的梦想。”（乔治·斯坦纳：《语言与沉默》）反观张惠雯小说，女性精神内核更加饱满，以清醒的自我认知能力和强大的心理建设能力，建立女性独立的现实路标。依附是短暂妥协，在任何困厄面前，她们都具备以己之力解决难题的决断与执行；在任何诱惑面前，她们都能不加拖沓地适时抽身。

张惠雯在新小说集中展示出处理物变、心变的优秀文学控制力。《飞鸟和池鱼》多采用今昔类比思维的故事模型，从感性的形象层切入，唤醒往昔之感，由纹理层面的意象和意境，刻画心灵的各异性。她讲究精致的“停顿”，也可以认为是一种“留白”，在给予和制止间抓住人的本质。“人的创造和堕落是

同样的事，而能够拯救我们的是我们内心的那火花，这火花并不在人的创造之中，反而归于那原始的深渊。从那被毁掉的、创造的废墟中闪烁出的宏伟或者崇高，正是原始的深渊发出的亮光。”（哈罗德·布鲁姆）《飞鸟和池鱼》集里的故事都是不同情态下的“深渊”，但谁也并不准备放弃他人、放弃自己，最终篇《关于南京的回忆》以“我”回到原轨收束，我没有被“细碎、无声跳跃的小光点弄得虚晃”（《临渊》），“有时，独自一人，当我想到他如今也快四十岁了、不知变成了什么模样，想到我后来过得很幸福、他也应该过得很幸福，泪水竟会涌满我的眼眶。”（《关于南京的回忆》）《飞鸟和池鱼》实现了从一个阶段（他乡）过渡到另一个阶段（故土）的经验转折，它如同“废墟”的意义，从瘠地中再造沃土，同时将生命中美丽的碎片用文字珍藏下来。我想，贯穿全文的情感主线是“温柔善意，那在别人看来虚无缥缈的东西，也许最后会成了记忆里最好、最持久而稳固的东西”（《良夜》）。

选自《学习强国》